

中国文学多维研究丛书

齐
红著

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多维研究丛书

J206.7

162

齐
红著

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 / 齐红著.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1110-708-1

I. 世... II. 齐... III. 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9238 号

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

齐红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846 发行部 0551-5108743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开 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江 琛	印 张	9.7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 数	217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708-1

定价 18.8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言

丁帆

1992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齐红携着曲阜师大的保送证明和资料走进了南京大学研究生面试的考场，一轮问题过后，大家给出了一致的答案：该生单纯，但有才气。接下来她就和本届年龄最大的陈霖成为我的开门弟子。

十八年前学界做女性文学的人还不多，我希望他们两个成为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于是，就给他们各自确定了论域：齐红做“女性视阈下的女性书写”；陈霖做“男性视阈下的女性书写（‘他塑’女性）”。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先设定的论域。后一论题在十年后被我的一个博士后接过去，终成正果，还在“百家讲坛”上开了两讲。这是我带研究生历史上的一件憾事。十几年来，由于许多主客观的缘故，齐红在学术上的犹豫和彷徨，致使她在学术界一度销声匿迹。好在这几年她奋起直追，重拾旧梦，做出了令人欣喜的学术成绩。此书的出版，正是她这些年的思考结晶。

从此书的结构编排来看，齐红对女性文学的学术思考是有独特性的，她选取的“她世纪”文化语境下的“她叙事”视角，无疑是对近二十年来女性文学研究核心观念的总结性概括。

正如齐红自己所言：“‘她世纪’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体现‘她世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写作，这个领域又呈现给我们什么样的图景？这是本书要探讨和描述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齐红紧紧抓住作家作品的微观分析，以大量的实证经验来证明一个被诸多批评家忽视了의论域盲区。

“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章之后，笔者有一个遗憾：即少有文章站在一个超越现象和现实的高度之上，对世纪之交的女性书写进行一次整体的俯瞰。本书试图在这方面作出一些突破，即重在考察世纪之交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的个人书写所具备的一种历史意味——这样一种写作，在整个女性写作的历史链条上，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体现了哪方面的历史意义”。就此而言，从微观到中观的作家群研究，再到宏观的文学史意义的探讨，从中，我看到了齐红可喜的进步——那种突破通常的女性批评家的研究格局，试图进入文学史大视野的学术眼光。

将90年代以来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分成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当然还有80年代）三个代际来分析，并非是为行文方便，更重要的是她们鲜明的“代沟”成为齐红学术观点的一大特色：“我们可以仅仅选用与三个代际的女作家相关的热点批评词汇来领略一下她们为世纪之交的女性书写带来的风暴，如果进行最简洁意义上的剔除，我愿意留下这么三个汉语词汇对应不同的女性写作群体：‘性与政治’、‘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我以为齐红对这一女性写作的历史环链的总结概括是有内在的循序渐进的逻辑次序表达的，三个时代女作家写作的不同人文底蕴造就了她们不同的审美风格取向。

的确，女性文学研究是在不断前行中发展演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齐红的女性文学研究也刚刚开始：“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转眼就要过去，女性写作也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当主要以网络写手起家的一批‘80 后’女作家显示人气的时刻，女性写作的语境是否会发生新的改变？这种改变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希望自己能够持续对这个话题的追踪与关注。”不错，对新一代女作家特征的关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决不能是在时间平面上的聚焦，更重要的是将其置于世界文化与文学的语境中，置于文学史的长河中进行多侧面的学术思考，才能在这一领域有突破性的研究。我以为齐红是有这个能力的，也是不会放弃的。拭目以待她日后新成果的不断问世。

是为序。

2009 年 7 月 22 日紫金山南麓日全食中

目 录

[1] 序言(丁帆)

[1] 前言

[7] 第一章 “50后”女作家

[7] 一、女性,作为“他者”的存在

[20] 二、铁凝:生命的谛视与反省

[31] 三、池莉:卑微的生存与倔强的灵魂

[40] 四、方方:重压之下的生命伸展

[54] 五、张梅:都市欲望中的浮沉与挣扎

[64] 附录:王安忆访谈

[78] 第二章 “60后”女作家

[79] 一、寂静之声:“60后”女性写作的历史意味

[91] 二、林白:个体经验的开掘与呈现

[111] 三、迟子建:尘俗世界的诗性构想

[123] 四、叶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穿行

[137] 附录:陈染访谈

[150] 第三章 “70后”女作家

- [151] 一、冷面的舞蹈：“70后”女性写作的历史意味（一）
[163] 二、蝴蝶的尖叫：“70后”女性写作的历史意味（二）
[176] 三、攀升或坠落：“60后”与“70后”女性写作的比较
[195] 四、金仁顺：爱情，作为人性的试纸
[205] 五、朱文颖：寻找心灵的出口
[215] 六、魏微：捕捉人心的去向
[230] 附录：朱文颖、魏微对话

[249] 第四章 “她世纪”的文化语境

- [249] 一、回眸 1995
[259] 二、浮出历史地表
[268] 三、作为女性发言
[282] 四、阳光与阴影

[298] 主要参考文献

[301] 后记

前言

早在 2001 年，这个刚刚进入新世纪的年份，就有媒体断然宣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女性的世纪——“她世纪”。《新周刊》2001 年第 4 期曾以泽塔·琼斯作封面，以过半的篇幅讨论这个话题，封面上赫然印着三个红色大字“她世纪”。其头条文章《她世纪》的开头就引用美国方言学会的调查结果，证实 21 世纪的“世纪之字”评选中，“她”以绝对优势战胜“科学”等候选字，成为“21 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历史”（History）——“他的故事”也许真的由此发生改变，“她”也许正在成为社会的绝对主角，正像海伦·费希所说的那样：男性的特性可能使他们在工业社会略胜一筹，但在由电子商务、网络社会和协作精神构成的新背景下，男性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①

这个概念几乎就这样被默认并使用下来——不是在学术研

^① 转引自《她世纪》，《新周刊》2001 年第 4 期。

究的层面上，而是媒介文化对当下语境的一种指认。而在此后的几年中，对新世纪的这样一个带有性别特征的概括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其他的文化、新闻周刊的封面上。有些文学批评也默认了这一概括，并直接使用这样的术语对新世纪的女性写作现象进行研究：比如《失位的舞蹈——浅论“她世纪”的女性阅读与女性写作》（《当代文坛》2005年第4期）、《“她世纪”的女性写作》（《科学与文化》2005年第10期）、《文坛“她世纪”》（《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52期）等等，虽都是些浅表层面的现象描述，但新世纪的性别写作与性别突显似乎已经从题目中可见一斑。

那么，“她世纪”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体现“她世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写作，这个领域又呈现给我们什么样的图景？这是本书要探讨和描述的核心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女性文学批评在中国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各种相关论文和论著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在1995年前后，“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更是引发了中国出版行业关于“女性文学”和“女性问题”类书籍的出版热潮。“世纪之交”对于女性和女性写作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由于其“变动性”和“当下性”的特点，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也多是零散的、局部的，且这些文章多半侧重于对某个具体现象、作家作品的阐释，比如张冬梅、胡玉伟的《群体关怀与个体言说——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读解》、吴武州的《近期女作家创作谈片》、王翠艳的《女性话语与时代历史的多重变奏》、吴颜媛的《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的一点反思》，等等，带有“谈片”式、截取某个断面进行剖析的特点。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章之后，笔者

有一个遗憾：即少有文章站在一个超越现象和现实的高度之上，对世纪之交的女性书写进行一次整体的俯瞰。本书试图在这方面作出一些突破，即重在考察世纪之交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的个人书写所具备的一种历史意味——这样一种写作，在整个女性写作的历史链条上，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体现了哪方面的历史意义。

“世纪之交”是一个变动的时代，经济的迅速发展、思想观念的解放必然带来“人”的变化，而“女性写作”作为展示“女性”这一性别群体的精神与心灵的特殊场地，也发生着富有意味的变化。活跃在世纪之交（1990—2009）近二十年的文坛上的女作家主要是三个“代”际的女作家，她们分别是出生于50年代（王安忆、铁凝、池莉、方方、范小青、蒋韵、张梅等）、60年代（陈染、林白、徐坤、迟子建、海男、叶弥等）、70年代（金仁顺、朱文颖、戴来、魏微、周洁茹、棉棉、卫慧等）的作家，三代女作家的写作恰恰向我们证实着不同时代女性生存面貌的不同，以及她们在不同阶段所遭遇的精神困扰。尽管一直以来在文学批评领域以出生年代作为对群体写作现象的概括一直没有被完全认同，但我仍然愿意使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三代女作家以及她们的写作现象：即“50后”女作家、“60后”女作家、“70后”女作家。

我们可以仅仅选用与三个代际的女作家相关的热点批评词语来领略一下她们为世纪之交的女性书写带来的风暴，如果进行最简洁意义上的剔除，我愿意留下这么三个汉语词语对应不同的女性写作群体：“性与政治”、“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

对“50后”女作家来说，1990年代前后是她们写作最为

成熟也是获得丰收的时期。在“三垛”、《玫瑰门》之后，铁凝又相继拿出了《对面》、《永远有多远》、《无雨之城》、《大浴女》、《笨花》等小说；而王安忆以女性为主角的长篇小说更是一部接连一部：《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方方则有《落日》、《何处是我家园》、《乌泥湖年谱》、《水随天去》、《树树皆秋色》、《水在时间之下》等作品的诞生……这个时段的“50后”女作家虽不如“60后”、“70后”那么热闹，但无疑，就她们个人而言，创作上的稳定与成熟期已经到来。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们更愿意关注普遍意义上人的存在状况，就其中的女性形象而言，她们的写作是对女性生存疼痛与呻唤的一种表达：歧视、束缚、压制……这些字眼虽不特别明朗地出现在“50后”女作家的文字中，但它们的确构成了女性生存的一种背景。她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女性在今天仍然持续的附属性质，即便如《无雨之城》中的美貌能干的女记者，又何曾在副省长普运哲心中占据过关键位置呢？只不过是生命中的一个小点缀而已。哪怕是为获得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女性因为抗争而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她们面临或遭遇着各种层面的威胁、逼迫、控制与侮辱，活着，特别是有尊严地活着成为一个乌托邦梦想。《何处是我家园》中的秋婆总是想要挣脱那无形的命运的控制，却越陷越深，在个人被凌辱后的噩梦纠缠中却又一步步将其他无辜女性推向了生命的深渊。

而面对这样的“存在之痛”，“50后”女作家更愿意进行一场“性别与政治”的理性反省，而不仅仅是控诉。她们更多是在反省与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一些造成女性生存现状的社会的、文化的、自身的根源。在铁凝的著名小说“三垛”（《棉花垛》、《麦秸垛》、《青草垛》）中，“性”——这种人类的本性之

一，在特定的年代里呈现出最单纯、原始却又最复杂的内涵：仅以《棉花垛》中的小臭子为例，“性”与“政治”在她的身上奇特地扭结在一起。最初“性”对于小臭子而言就是一种朦胧的、本能而单纯的冲动——她愿意跟男孩子在一起，玩一些带有肌肤亲密的游戏；而当这种肉体上的冲动可以为她换回所需要的物质时，她当然不会拒绝与汉奸秋贵的往来；同时这种关系又将她与政治牵连在一起：抗日组织利用她与日本人的关系从她那儿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但政治上的“有用”却不等同于道德上的被宽恕，小臭子在“自己人”那里仍是被置于舆论的反面，直到最后被判“死刑”——在死亡之前，死刑的执行者“国”又完成了对小臭子肉体的占有。

“60后”的女作家将这种疼痛以更为尖锐化的方式呈现，她们拒绝反省，因为失望和绝望，肆意的宣泄成为反抗的另一种方式——此前从没有一个女作家的群体以如此执著的方式言说那些来自女性内心深处的“私人化”体验，因此，“私人写作”、“私小说”等概念频繁地加之于林白、陈染等女作家的头上。林白的《说吧，房间》和陈染的《私人生活》是这种女性私小说的极端化文本，单单从题目上我们就可以感觉出两位女作家对某种内在隐秘的宣泄或发泄的强烈渴望。如果说性别意识在“50后”女作家那里的体现是对文化、政治、女性自我的理性反省精神的话，那么，到了“60后”女作家这儿，性别意识就是在最大意义上张扬那曾经被压抑和遮蔽的一切，越是内在化的、隐秘的体验越具有僭越的强度。这样的立场与姿态也将两性和解的可能降到最小的限度：在“60后”女作家笔下，男性被她们毋庸置疑地放置在一个极端的对立面上了。

到了“70后”女作家笔下，这种局面有所改变。性别的压

抑感不再像上两代作家这么明显，她们以相对平静而坦然的方式面对生活中的诸种现象，或嘲讽，或批判，或容纳，也不乏立足于性别本身而作出的各式姿态展示，但性别的焦虑感缓和下来。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以卫慧、棉棉、盛可以等为代表的“70后”女性写作的一个分支则将“私人化写作”推向了另一个极致：“身体写作”。事实上，当“60后”女作家在自己的文字中将“私人化”放置在“身体”的隐秘变动与需求上时，就已经有批评家称之为“身体书写”，只是这个概念在当时没有成为气候。如果说在林白、陈染们那里，关于“身体”的言说还带有陌生、新鲜同时不无羞涩的拘谨之态，那么到了卫慧、棉棉们笔下，“身体”在以前所未有的放松姿态展览、炫耀，无所遮拦，身体的迷狂即是精神的迷狂，在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有意或无意地让“身体”负载了精神的内涵，一个已经被认可的事实是，肉体的欲望因为打着“另类”、“自由”的精神幌子而弥漫、泛滥，最终彻底挤兑了理性精神的存在。当然，“身体写作”仅是“70后”女性写作群体的一种类型，这个群体的另外一个分支——以金仁顺、朱文颖、戴来、魏微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们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数，她们更愿意用冷面而理智的方式打量这个世界，由此带来了“70后”女性书写的另外一种景象——这一点在书中我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转眼就要过去，女性写作也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当主要以网络写作起家的一批“80后”女作家显示人气的时刻，女性写作的语境是否会发生新的改变？这种改变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希望自己能够持续对这个话题的追踪与关注。

第一章

“50后”女作家

以1950年为界，在这之后的50年代出生的女性写作者，我姑且把她们命名为“50后”女作家，虽然这个概念像任何一个以出生年代作为文学界定方式的概念一样，经不起严格意义上的推敲，但是这个概念里包含的关于写作、关于经验的共性，以及这种界定为研究带来的便利（至少是言辞上的概括力及简洁意味）使得我个人仍然非常乐意使用这样一个概念来完成我对一个群体的论述。

一、女性，作为“他者”的存在

这个群体包含着这样一些曾经活跃和仍然活跃的名字：张辛欣、铁凝、王安忆、池莉、方方、范小青、蒋韵、张欣、张梅……这些出生于50年代的作家走上文坛的时候，中国那段最压抑的时期已经接近尾声。因此，与前一代作家（张洁、谌

容等)相比,她们没有那么多来自政治的灰色记忆,个人的生命体验也相对单纯;但意识形态的渗透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她们的价值观,使她们不可能像下一代女作家(“60后”)那样义无反顾地张扬性别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缝隙间,“50后”女作家们的性别书写具有一种独特意味。

1. 立场:以“第三性”的目光

如果从性别的角度对整个“50后”的女作家作一次整体的俯瞰,你会发现这一代女作家笔下真正关注女性个体生活和生命情态的作品并不太多。以相对鲜明的性别立场走上文坛的张辛欣倒是曾经留下过诸如《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作品,但在短暂的权利呼吁之后,她开始走向女性之外的世界:《封片连》、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大运河》等,无论从哪个层面上,都不再是,或不仅仅是对女性生存的关注。当然,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张辛欣倒是一个实践着女性自立自强理念的成功个案。

“50后”女作家群体中最富有成就的两位女作家当是铁凝和王安忆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登上文坛,到当下为止的三十年写作历程中,她们为文坛提供了而且仍在提供着较为厚重的文学作品,但在这些作品中,真正表现女性生命问题、关注女性性别现实的写作却显得稀少。

即使是那些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小说写作,“50后”的作家也不会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投注个人化的情绪和经验,而“60后”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作家个体的经验特质,虚构与真实杂糅在一起,以至于模糊了自我与主人公的界限,“私人生活”(陈染《私人生活》)似乎既是故事中的女性人物的私人生活

活，也是作家自我的经验展现。

与“60后”相比，这一代女作家从不愿意在性别上对个人的写作行为和生命立场作出强调。她们中的代表人物王安忆、方方、铁凝等曾在不同场合或隐或显地表示过对“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排斥和拒绝。

“50后”女作家的侧重点指向文化——且是文化中的女性群体，而非个体的探究，虽然主人公有时仍以个体的方式在故事中穿行，但这个“个体”却往往蕴含着“一代”或“某类”女性的普遍生存意味。而在观照这样一个性别群体时，“50后”女作家是将笔下的女性主人公放置在“他者”的位置之上的，作家自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这种旁观与“他者”意味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50后”女作家似乎从来不想特意地在小说中表达女性的诸多层面的问题，这意味着她们的关注焦点不在女性，而在普遍意义上的人——引发作家兴味的首先不是性别，而是生存的诸多问题本身。这一点在很多“50后”作家那里都有所表现。比如擅长表现小人物日常生态的池莉，似乎更愿意让“印家厚”充当她的代言人，这个广大人群中比比皆是的工人形象极富表现力地呈现出她个人的写作理念。方方、范小青笔下的人物群落中，女性同样不是主要的言说者，“七哥”（方方《风景》），叶民主（方方《埋伏》），苏非、林嘉禾、丁子恒们（方方《乌泥湖年谱》），王才（范小青《城乡简史》），万泉和（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这些曾经在文坛引起震动的小说主人公们多半是男性。

第二，即使小说的主人公是女性，“50后”女作家更想在这个女性身上展示的也多半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的生存问题，或